

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确定性

孙利天¹ 吴旭平²

(1.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后形而上学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拆解和批判,认为后形而上学思想是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后形而上学思想家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西方后形而上学思想只是明确地反对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并力求在柏拉图主义的根基处开启新的思想方向,探索更好生活的可能道路。思考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确定性,才能理解其思想的旨趣和目标,才能合理借鉴它的理论态度,澄清我们自己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任务。

关键词:后形而上学思想;好生活;思想方向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1-0001-06

从传统哲学到后形而上学思想,是近年来西方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变。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各派对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解不同,但他们在拒斥和批判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中却有许多相近或相似的看法,从而使后形而上学思想在与传统哲学的区分中显示出某些共同的思想特征。在后形而上学思想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传播中,其文化影响和文化形象给人们的主要印象是拒斥、拆解、批判、反叛和摧毁,这似乎是西方古典思想中既有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当代的复活,似乎只是单纯的否定和破坏,而没有确定性和建设性,这是人们对后形而上学思想最严重的误解。即使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亦很少有人自认为是相对主义者,而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终结之后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恰是克服西方哲学的虚无主义。思考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确定性,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的旨趣和目标,也才能有超越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新的思想的可能性。

一、什么是后形而上学思想

哈贝马斯的著作《后形而上学思想》把现代哲学的主题规定为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和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①这四个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主题相互交织,构成了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主旋律。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即把内在意识中的纯粹思想,转变为多种话语方式和交往实践中的具体思想,从而也就使绝对的理性、抽象的理性转变为具体实践中具有确定性和有效性的具体理性,进而也使强大的理性概念和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受到弱化和颠倒,社会交往的话语实践是公共理性的前提,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克服了西方两千多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按照哈贝马斯的思路,后形而上学思想尽管不再是传统哲学的纯粹思想、绝对思想,但也不是经验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思想。在交往实践中仍需有理想化的、无条件的理性预设,唯此才能保证思想的批判性、超越

作者简介:孙利天,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吴旭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页。

性的旨趣。所以我们可以说哈贝马斯理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是后绝对理性和绝对思想、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上思想。

海德格尔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更早表达了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特点和任务。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主义,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宰制和控制存在,是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方向。“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这一进程的展开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领域中正处于鼎盛。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①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20世纪西方哲学中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是表征着哲学的完成和终结,作为后柏拉图主义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则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任务,用他自己的说法即是实现“思想的移居”^②,要回应存在的召唤,思考存在的澄明,让思想植根于、归属于存在。后形而上学思想是新的思想居所的寻求,是新的思想方向、新的视界的开启。

在美国哲学家罗蒂看来,海德格尔乃至哈贝马斯都未完全达到后形而上学的视界,他的一本中文版自选集似乎有意区别于哈贝马斯而名之以《后形而上学希望》。罗蒂主张用想象力代替理性,用希望代替知识,亦即在清除了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之后,作为公共生活得以可能的条件不再是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也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而只能是从人们的同情心中产生的社会团结和更好生活的希望,即乌托邦。罗蒂所以不用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说法,可能是因为思想这个西方哲学的术语存留着浓重的柏拉图主义积淀,思想似乎意味着规定、深刻,意味着本质、基础的揭示,这是一个有形而上学嫌疑的术语。但在中文语境中的思想可能有十分宽泛柔软的语义场域,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和怀念,对丰收的企盼和展望,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对困惑疑虑的破解和消除,等等,都是所思所想。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罗蒂的后形而上学希望看做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思想。罗蒂以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清除了理性形而上学的人的形象,没有坚实可靠的理性指引我们的公共生活,人只能在文化进化的偶然机缘中想象、希望和创造,或许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西方传统哲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在对纯粹思想的寻求中找到思想必然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逻辑,是直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的最高目标。逻辑有必然性,而事实上什么都可能发生。在变幻莫测的经验世界中,纯粹思想的普遍必然有效曾经是替代上帝的拯救之途。哲学用强大的理性概念阐明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存在基础,说明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指引出我们如何通过理性和逻辑的力量接近上帝之路。这种对世界和生活统一意义的解释,被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叫做同一性的死亡哲学,叫做思辨唯心主义的宏大叙事,更普遍的说法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法国后形而上学思想保留着启蒙以来法国哲学特有的锐利、新颖和奇异,哲学家们在一些令人吃惊的课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德里达通过“延异”和解构主义的阅读,揭示了任何文本内在具有的意义的矛盾和分裂,炸毁了意义的统一性。福柯通过对疯狂、性欲、监狱等历史的考察,发现了权力与知识交织构成的规训系统,它们是不能还原的断裂的知识层面,科学、思想和社会没有连续的意义统一性。利奥塔反对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宏大的解放叙事,也是一种同一性哲学,而理性的同一性、哲学的同一性必然是对非同一和差异的压制。他和一些后形而上学思想家认为同一性哲学要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

对具有不同面孔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尝试作出某种统一的概括和归纳,这本身就是后形而上学思想所反对的形而上学方法。但正如许多后形而上学思想家已经自觉到的西方语言和思想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那样,只要书写和言说,就不同程度地需要逻辑和理性,并且期待着具有同样逻辑和理性能

①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4页。

② F. 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辑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力的人的理解。理性和逻辑的同一性预设是无法驱逐的形而上学幽灵。用逻辑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用理性破除理性同一性的压制，批判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必是一个同样宏大的叙事，这些是后形而上学思想难以挣脱的悖论。以致普特南说“令我吃惊的是，自称是解构主义者并痛恨哲学中的‘独断腔调’的哲学家，自己就无情地独断并且是一个无情的普遍化者（generalizer）。人们读过德里达之后仍存在的疑问是：就算德里达极其厌恶人们把他看做是非理性主义者，他事实上是否给自己留下了回应这种指责的对策？”^① 我们不知道德里达是否和如何回应普特南的指责，但我们看到罗蒂曾回应人们对他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指责“我们实用主义者通过作出如下回答来对称我们为‘相对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的种种指责不屑一顾，这些指责恰恰以我们反对的区分为前提。假如我们一定得对自己作些描述，也许我们最好称我们自己为反二元论者。”“我们反对一组特定的区分，柏拉图式的区分。”^② 罗蒂认为，绝对之物与相对之物、被发现之物与被制作之物、主观和客观、实在和表象等等的区分，是柏拉图式的二元区分，这种区分已成为西方文化的“理性”和“常识”，但反对这种形而上学和基础主义的区分，并不就是非理性主义，而只是给了理性以新的含义。与罗蒂相似，海德格尔也认为自己的哲学不是非理性主义，而是比科学技术更清醒些的思想。^③

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共同特征是反柏拉图主义，其悖谬性的理论后果是凸显了柏拉图主义的理论特征，经过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等人的批判，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获得了清晰的理论刻画。以致我们要理解后形而上学思想必得首先理解柏拉图主义，只有理解形而上学才能走出形而上学而进入后形而上学思想，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形而上学复兴吗？不仅如此，海德格尔力求实现的“思想的移居”，哈贝马斯寻求的交往理性，甚至罗蒂的实用主义的理性理解，其实质都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理论，是区别于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的形而上学思想，后形而上学思想仅仅是区别于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新的形而上学。它与柏拉图主义的区别在于要以谦虚的、有限的理性信念，要以更敏锐的对普遍性、同一性压制的警觉和揭示，重新释放自由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重新确立思想的根基，以使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和多元动荡的世界中寻求更好生活的可能性。

二、好生活：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规范基础

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论形态似乎是对 20 世纪初英美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主题的直接继承，批判拆解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是它的核心话题和主要任务。所以，后形而上学思想总是给人以否定的、怀疑的、消解的印象。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后形而上学思想与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和各派分析哲学有着重要的原则区分。用罗蒂的说法是科学哲学在向后哲学文化运动中仍保留着未被消解的冰块，即对逻辑和科学的崇拜。科学哲学的实质是以科学的标准拒斥形而上学，或者说它的形而上学批判是以逻辑和科学作为规范的基础。后来的日常语言学派虽然不再以理想的逻辑语言拒斥形而上学，但仍希望从日常语言的意义中把握现实的人类思维结构，清除形而上学的无意义的胡说。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理想是寻求意义的确定性。后形而上学思想可以理解为是生活世界转向之后的形而上学批判，它消解了对逻辑和科学的崇拜，把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潮视为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完成，把意义确定性的寻求转变为更好生活的理想，它的形而上学批判是以“好生活”作为规范的基础，从而使后形而上学思想获得了新的理论确定性的基础。

包括柏拉图主义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都有不能割断生活世界之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生活哲学，都是人类更好生活的理想。伽达默尔评论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 20 世纪实现了生活世界转向，

① 陈亚军《论心灵、意义和实在——J. 哈伦访 H. 普特南》，《哲学译丛》1994 年第 1 期。

②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第 90 页。

③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 1260 页。

其实这个转向的实质可能只是人们对“好生活”的理解有了根本的不同。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是绝对理性的形而上学，是纯粹理论态度的形而上学，它所理解的“好生活”就是通过无限理性追求从而使人接近神的好生活，它成就了客观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主义是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控制、宰制存在的主体形而上学，它遗忘了存在的意义，把人从存在中连根拔起，使人类生活陷入无意义的黑夜，使人的自身生产陷入危机之中。罗蒂认为，柏拉图主义是一种基础主义哲学，是“自然之镜”的哲学，它幻想把握绝对之物、终极实在的绝对真理，不可避免地导向学科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政治学。人类若保留自由、民主的社会希望，只能用“民主代替哲学”，走向后哲学文化。哈贝马斯更关心的是如何完成启蒙的未竟的事业，如何在重新确定理性的定位中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通过社会交往实践重建人类的团结和社会同一性。总之，后形而上学思想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并不是单纯地拆解和否定，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更好生活的理想和希望。把握住这种理想和希望，我们才能真正认清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后形而上学思想既是一种理论批判，也是一种生活批判，它较之于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更为深刻之处，在于它以一种或几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力量深入到柏拉图主义的根基之处，力求在西方思想的起点上重新开启新的思想方向，打开人类更好生活的新的思想道路。在这样的意义上，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价值即在于它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是一种整全论说的新的世界观。按照这样的理解，海德格尔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显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海德格尔的学说真的成立，他就应该是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史上第二个柏拉图式的人物，因为只有他才开始扭转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方向。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领会开始，力求找回前柏拉图主义的存在经验，寻求思想对存在的不同态度或姿态。柏拉图主义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改变了希腊早期逻各斯的意义，把作为“聚集”的逻各斯变成了理念或本质的逻各斯，把顺应、回应存在召唤的思想转变为用思维规定存在的思想，从而使整个西方文明走上了用思维规划、计算、控制存在的主体形而上学。这种人的优先性视野如今走到了尽头，新的思想任务就是实现“思想移居”，重新回到思维扎根于、归属于存在的前柏拉图主义经验。海德格尔以先知式的热忱和诗化的语言宣告一种新的思想开端的启明，预言一个拯救人类的新上帝的降临。和任何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海德格尔也难免被自己的思想所感动和迷惑，从而夸大了自己思想的意义。回到柏拉图主义的根基处，探索新的思想方向和道路，从根本上超越柏拉图主义，这是马克思已开始的哲学革命。马克思通过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使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哲学、独立的哲学消解在现实的感性物质活动之中，思维规定存在的理论姿态转变为实践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这虽然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优先性”视野，但实践把握的存在可能更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和自在性的硬度和力量，或者说更易使存在自身显露出来。即使如此，海德格尔哲学的原创性和革命性仍不可低估。倾听存在的召唤和大地的言说，从存在的敞开中进入存在之思，绝不仅是诗意的美学的呼唤，而是走出人类自身生产困境、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可能的思想方向，它可能是人类未来更好生活的必然选择。

在阅读后形而上学思想家的文本时，我们能够感受到罗蒂特有的透彻和清晰，这位最坚决彻底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的哲学家，也最彻底地表达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种基础主义的哲学观和文化观。形而上学总是基于某种人性观或人的自我理解，罗蒂明确断言“实用主义奠基者都把自然主义达尔文主义的人类观与对于哲学继承自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的问题的怀疑结合了起来”，“通过使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相连接，詹姆斯和杜威都想把哲学与达尔文调和起来”。^①他相信，“同柏拉图或康德看待人类的方式相比，以这个生物学方式来看待人类”^②会更好些。罗蒂以美国式的坦率和真实，不怕这种生物学观点的人类观“冒犯了人类的尊严和自尊”。但他是否自觉到这种自然主义达尔文主义的人类观也是一种独断的形而上学呢？用生物学的观点看待人的理性和文化，理性即是

①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②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适应环境和更好生活的策略和工具，文化即是种种偶然的机缘中缓慢进化的文明形式，这就彻底清除了柏拉图主义的绝对之物和客观真理，清除了对人类理性和文化的目的论理解。这样理解的人和理性，虽然避免了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专断和威权，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学提供了理论辩护的可能，但它是否也隐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险呢？罗蒂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背景下阐发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政治学意义，他主张用民主代替哲学，用同情心限制乃至战胜残酷，用希望代替知识，而希望的乌托邦全赖于人类同情心这种美好的情感。罗蒂不同意哈贝马斯以无限理性为条件的交往和对话的公共理性，而代之以同情为基础的团结的希望。但在我们看来，同情心作为一种社会情感，恰是社会理性或公共理性的起点。罗蒂可能仍受到柏拉图主义二元区分的迷惑，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和情感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也许还是黑格尔看得更清楚：每一个体的自我意识就是欲望，它只能在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真实的自我意识是它自己和它的对方的统一。在精神的概念里，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① 每一个体对他者或人类的同情，是自我意识向精神的发展中自我的普遍化和理性化的过程。缺少或没有同情心不仅是自然情感的缺失，而且是理性能力的缺失。总之，罗蒂既坚决彻底地否定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理性概念，也阐发了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生物学观点的人类观，却也必须省思这种地道的美国精神对我们的意义。后形而上学思想似乎并未超出西方哲学拆解和建构统一的基本逻辑。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它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是否真的在柏拉图主义的根基处开拓出新的思想方向和道路，从而为人类更好生活提出了新的可能和希望。按照德里达的看法，后形而上学思想也要对思想和未来说“是”。形而上学是永恒的思想事业，人类不能停止思想。

三、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态度

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思考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意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理论态度的启示，即超越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根基，探索新的思想方向的多样可能性。与西方哲学的际遇不同，当代中国哲学正处于中华民族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面向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希望，我们可能需要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都有所吸取和借鉴，我们需要更加多元开放的哲学观，需要更为灵活务实的理论态度。

从生活世界之根思考哲学或形而上学理论的意义，我们总能找到某种形而上学之中的“好生活”的理想，并且它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规范基础，亦即“好生活”作为或隐或显的最高原则规定了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所以，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也就是什么是我们所希望的“好生活”？我曾认为，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我们渴望的好生活，它应成为我们评价、选择和创造哲学理论的标准。^② 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对后形而上学思想反对的柏拉图主义也应有不同的理论态度。黑格尔、胡塞尔等把始自希腊的西方哲学看做纯粹思想或理论态度的思维。所谓纯粹思想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的态度，二是去掉思想内容单纯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学，三是在全部思想内容中反思或直观其最高本质的辩证法或现象学。胡塞尔把这种理论态度的思维看做是哲学的实质，把这种希腊理性精神看做是欧洲文明的灵魂。这样理解的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对于我们有何意义？我们是否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态度，我们文化传统中为何缺少发达的思维形式研究的逻辑学，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否也在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即使是黑格尔辩证法所要扬弃的知性思维对于我们民族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可能也有重大意义。总之，我们不能轻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0-122页。

^② 孙利天《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20期。

率地拒斥柏拉图主义。盲目地追随后形而上学思想,会使我们民族的思想根基更加漂浮不定,我们就更难以透彻清晰地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理想。

与柏拉图主义对人的理性理解不同,也与罗蒂生物学观点的人类观不同,中国儒家思想传统把人性理解为道德实践的能动性,^①理解为得于自然或天命的良知良能。按照海德格尔式的哲学史追寻,我们是否也应追寻未被纲常化、名教化的中国儒家思想的源头,重新找回古典思想的活力,这可能是中国自己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具体说是我们需要反对的形而上学不是柏拉图主义用思维规定存在的形而上学,而是用道德规范规定人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用纲常名教、身份等级桎梏人的形而上学,是强权道德合理化的形而上学。剥除掉两千多年封建统治者强加于中国儒家思想的权力语言,清洗掉道德意识凝固化而成的礼法纲常,我们也许会寻找到中国儒家思想鲜活的存在感受和存在经验,使我们能够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处凝视、逗留、比较,探索我们自己的思想道路。在儒家的文本中有许多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理想,如学而时习之的快乐,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在暮春时节青少年们浴乎沂、咏而归的快乐,乃至颜回在贫穷中亦能保持的快乐,等等。这些快乐所以可能,在于儒家以仁爱之心面对生活和世界,即使面对礼崩乐坏、颠沛流离的艰难时世,孔子仍以孤往的勇气坚守着一种仁者爱人的存在态度。这种存在态度或存在经验,既不同于用思维规定存在的希腊理性精神,也不同于海德格尔让思维归属存在的态度,当然也与生物学观点的人类观大不相同,是一种有主体道德自觉而没有主体形而上学的德性之思的思想方向。

破除中国传统的名教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政治中心主义,追寻中国儒家思想起点上的存在领会和思想方向,西方后形而上学思想对我们的意义充分显示出来。对人的有限理性的高度自觉和对普遍性、同一性压制的高度敏感,是后形而上学思想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它的真实意义可能不在于终结了形而上学,而是划定了形而上学的界限。罗蒂可能也知道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人不能没有形而上学,但他希望形而上学的思考只是个人的精神事务,形而上学不能非法地僭越成为政治理性或公共理性。福柯在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西方文化传统中,看到了权力与知识合谋的权威话语对差异性的规训和惩罚,破除了统一的客观知识的幻象。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有权力与道德合谋而成的权威话语,它以教化与惩罚两手构建政治合法性同时也渗入微观权力的场域,成为无所不在的形而上学暴力。想想中国家庭的子女教育方式,我们仍能感到鲁迅“救救孩子”呼喊的沉痛,也深感中国式的后形而上学思想道路的漫长与艰难。

责任编辑:马妮

^① 孙利天《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5期。